

撕裂与抉择:五四精英文人政治文化管窥

班瑞钧¹

(绍兴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五四时期,精英文人渐趋成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中的先行者之一。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体验并介入了现代与历史、个人与国家交互间意义关联方式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引发了他们政治文化层面的撕裂及撕裂状态下的政治抉择。面对现代性、面对历史主义,是苟且还是重生?是继续持循环论还是持发展思维?这种状态也对五四精英文人形成反身性意义投射,即他们不得不在重构自我过程中面对是保持传统建制下的君子角色还是转型成为民族国家的公民?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自身会被历史所遗弃还是成为历史发展的角色担当?五四精英文人身处的撕裂与抉择的政治文化景观,既呈现和揭示了五四精英文人自我转型的苦痛与错落,又展现了他们对于自我探索与追求以及更深层地卷入了对民族国家政治叙事的复制与摹写。个体与类的相互规定性就在这一历史变迁中逐渐稳定明晰。

【关键词】: 政治文化 五四运动 精英文人 撕裂 抉择

【中图分类号】: K825. 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19)04-0052-06

中国在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早期经历了政治体系大变局,又叠加印刷出版技术的突破、科举制度的废除,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爆发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变化从根本上瓦解和摧毁了出身传统士大夫(身份的或精神的)的五四精英文人乃至整个传统中国赖以存在的旧有意义关联领域。当时的“中国”与“世界”让五四精英文人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切身感受到了亨廷顿式的文化“撕裂”(torn),也更深地体验了现代与历史、个人与国家交互间意义关联方式的巨大转变:“(使)吾人之精神界中,种种庞杂之思想,互相反拨,互相抵销,而无复有一物之存在,如斯现状,可谓之精神界之破产”,^[1]“破产而后,吾人之精神的生活,既无所凭依,余此块然之躯体,蠢然之生命,以求物质的生活,故除竞争权利、寻求奢侈以外,无复有生活的意义”。^[1]在此“座架”下,如何为块裂的中国社会重建一个意义关联域就成为最重要的时代剧情主线之一。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性,正在于其为中国社会重建新的意义关联域达致新政治样态的努力:“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巨变。”^[2]“这一事实形成后就拥有了自身的演化逻辑,在表面上并未大规模改变既定的显性规则制度的同时实现了类似制度变迁的结果。”^{[3][52]}

这一时期,精英文人渐趋成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中的先行者之一。他们以引入现代性背景下的历史主义观念为先导,开始用发展的与进步的眼光理解世界,并逐步产生并完善了诸如新与旧、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革命、农民与地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等二项对立的功能叙事结构。这种以创造“历史”、追求“解放”为意义域的追求,无疑对五四精英文人文本中的“个人”叙述——潜在的是对自身“历史位置”的认知——形成了反身挑战:自身该怎样处身于新旧世界的交替之中?又该以怎样的方式与新旧世界发生意义关联?对这些问题的体认在撕裂与抉择的时空中错落迁转。

一、进入“现代”:苟且还是重生?

作者简介:班瑞钧(1973—),男,内蒙古包头人,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
网络出版时间:2019-07-02 10:21:48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90702.0757.006.html>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现代性”以横切与迫入的姿态强势登场。伴之而来的,是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爱恨交织的“情意结”:既有生死存亡的考验,也有涅槃重生的机缘。作为一种社会思想状态,作为与“后现代”相对应的分析工具,现代(modern)和现代性(modernity)的核心是理性信仰:即相信人可以凭借自身的理性认识自然、改造社会乃至掌握自身的命运。其重要特征表现为建构和追求“主体的自由”。而“主体”既包括个人主体,也包括民族国家主体。五四运动之后,社会精英开始认识到“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4]“着力点在于将个体与类交融互摄”,“历史生成性地实现个体与类的相互规定性”。^{[3]49}这一通过完成民族国家构建来达致个人解放的路径是解决当时中国政治的现实选择,当然也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等政治领袖的不二共识。“中国自五四起……主要是以(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为模仿和追赶目标。”^{[5]262}五四精英文人的“现代性”认知,不仅在于洋溢着强烈的启蒙理性,也不仅在于对“人”的觉醒的尖锐呐喊,而更在于对未来祖国的想象与叙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启蒙’,并不仅仅是指‘个人’的觉醒,它同时还是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觉醒,‘救亡’不但不是‘启蒙’的对立面,而且是‘启蒙’的一个基本环节”^[6]。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个人’就始终是民族国家中的‘个人’,或者是作为民族国家变体的另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阶级’中的‘个人’”。^[6]

当然,五四精英文人对于“现代”并非毫无怀疑。在他们看来,不但能否有效参与“现代”不可知,而且“现代”、理性等启蒙主义的根基都遭到怀疑。这样的怀疑源于五四前后思想状况的龃龉:五四在输入现代性启蒙思想的同时,也输入了各种反现代性的思潮。比如叔本华、柏格森、尼采等现代主义(反现代性)的思想与理论,就在五四时期随着进化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学说传入文人圈,对王国维、章太炎、鲁迅等先觉者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这就造成了五四精英文人典型的撕裂景观:一方面,是对“现代”及其所包含的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等基本现代理念的疑心和犹豫,对新意义世界的犹疑不安;另一方面,却仍以构造新的想象性关系为己任,在批判旧文化与旧社会的同时,瞩目于新的伦理秩序的建设。

这种“丰富的痛苦”无疑缘自五四精英文人把“现代性”精神成长安置到一个前现代的传统践履模式里——或者说——以一种传统的认识模式来理解已身处现代性语境内的自身。他们也面临前人类似的境遇:“已经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仍然是自屈原开始的中国传统的承续”。^{[5]212}五四时期,陈独秀一边革命一边又要求青年以孔子作为进取不悛的楷模,^[7]吴虞一边骂孔子一边又承认“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8],周作人说得更明确,他直接承认自己的道德观“恐怕还当说是儒家的”^[9]。以“全盘西化”为标签的胡适事后也追忆:“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10],“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我不能说我自己在本质上是反儒的”^[11]。至于人生操守及道德奉行等诸多方面,五四精英文人对传统伦理价值的认同更是强烈。他们在公论中的激烈表述与他们自己私下对传统的看法往往有明显落差。五四精英文人的反传统很大程度上既是因应历史要求而采取的策略性行为,也大概率地引致精神层面的撕裂景观:“不得不攻之者,势也”。^[7]

二、重构“历史”:循环还是发展?

新文化运动到五四时期,所谓为中国社会重建新的意义关联域,就是通过叙事建构一种指向“现代”的总体性“历史”,为社会个体和群体提供信仰选择与自我实现的意义根据。现代性与历史主义的“历史”在政治思想史上近乎伴生关系:一方面,正是由于启蒙理性的确立和人义论对神义论的取代,“历史”才从传统(尤其是宗教传统或文化传统)时间观念中获得自己的形式;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有了“历史”这种特殊的表达形式,现代性才被人们深刻理解,才得以深入社会思想的各个横向与纵向的层面,甚至还因此成为时代价值的本原。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如编年史),只有历史主义的“历史”才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在历史主义(historicism)视角下,“历史”指谓一种建立在单向度线性时间观念基础之上的对于人类过去生活的叙述(历史主义的“历史”在后文中一般将不再加引号,标题除外)。这种定性暗喻着理性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逆转。于是,历史就具有了目的性、导向性、“一种特殊的可

理解性”^[12]：“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人类事件‘流水账’式的百科全书，而是一种尝试，试图想在人类社会整个发展过程中发现一种有意义的模式。”^[13]这种“有意义的模式”实际上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解释成理性的和进步的过程，其结果是，“历史成了走向某种目标的进步过程”。^[14]

五四时期，文本叙事要真正走进现代，不仅要拥有现代思想，而且要能够通过时间、通过历史来表达这些思想。无法进入历史，就不可能进入现代。故在叙事中，现代首先是指文本对理性、“人”的觉醒以及对民族、阶级解放等现代性思想的发现与认同，其次才是指对相应表达形式——历史叙事——的探索和运用。五四以后，精英文人对现代性叙事结构的发现与建构，首先是与来自西方的现代线性时间观念密切相关。“今之世界，所谓大通之世，处斯时世，倘欲有所树立，必应受世界教育，得世界知识，有世界眼光，具世界怀抱，并令身亲种种世界事业。”^[15]建构在西方线性时间观念基础之上的历史叙事功能结构便成为文本叙事走向现代的首要问题。“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16]

五四时期，新的想象性关系的出现，有赖于“历史”对个体的界定和解释。启蒙主义的个体界定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认为个体——与群体一样——只有分享了“历史”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马克思建立在物质生产上的历史必然性，都是个体获得自我意识与主体能力的源泉，人的本质也就因此表现在其认识、承担和创造的能力。从启蒙主义来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两点：其一是他能够认识、领受“历史”背后的本质（理念），并因承纳与分享这种理念而获得自我本质，获得自身主体性；其二是拥有了本质，他就可以再以这种主体能力去推动理念自身的实现与展开（即创造“历史”），而在“历史”进步的同时，人也得以将其自身本质投射到对象物上，将自我的本质异化为社会现实，获得创造的意义与欢乐。“历史”在这里为个体提供了意义充盈的想象与奉献空间——在激越澎湃的五四时代，个体只有拥纳新的理念，比如民主自由等，比如个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然后，才有可能获得自我的觉醒，然后，才有可能在献身这些理念的过程中获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历史”以此将生命的“轻”转化为了“重”。很明显，启蒙主义对个体的这种界定催生了五四时代自我与世界之间新的想象性关系。既然个体只有在“历史”的照耀下才能获得自身的价值，那么，“历史”就会变成对个体的一种现实的和精神的要求，就会变成一种新的意义关联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意义就是双重的：一方面，个体开始在这种意义空间中寻找幸福；另一方面，它还同时在为变动中的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伦理资源。这种“历史”就是现代性语境的实质。投身“历史”，以新的价值理念为理想追求，将自身化入一个不断进步的时间叙事，是五四时代普遍为知识分子所接受的现代性信仰形式。而这种信仰既然发生在不断进步的“历史”中，它就必然包含对现实与自我的不断创造与扬弃，故福柯说，“现代性不单是一种与现在相联系的形式，它要使联系形式发端于自身之中”。^[17]这种现代信仰是五四精英文人在文本中展开自身想象时的基本前提。

三、重构自我：君子还是公民？

依赖智力和社会性的优势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的人类，个体生命也许轻于鸿毛，但每一个时代的主导性文化都不鼓励社会个体以“轻”的方式看待和体验自身；相反，它竭力催发人们“主动”建构自身“重于泰山”的主观意象。这种赋予个体生活以意义和价值的意识形态，把个体“生活的真实性”转变成了一种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个体获得了对自我生活的理解和对自我行为的规划与激励，从而积极参与将想象变为现实的历史进程。五四精英文人大都倡导并体认了这一变迁路径。在“文化”的意义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首先是对传统文化与价值生活的背弃乃至摧毁，然后在传统文化废墟之上为中国社会建设现代性意义关联系统。“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巨变”，^[2]为五四精英文人提供了新的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想象性关系。

个人认知的中国传统范式显然来自于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一般而言，理想状态的“人”应达到“天人合一”圆融境界，即超越了有限自我、达到普遍和无限的终极境界，“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对于精英文人，自然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他们自任“道”的承担者：“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以此来确证自我在社会中的意义。这种德性伦理使精英文人被赋予了自我实现的可能与权

利,也使他们在个人叙事和他者叙事中得到了自我深入表现和被他人深入观察的机会。所以,在古代文本中,无论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18]的宏图大志,还是那种自托为“弃妇”的时不我遇的伤痛,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古代精英文人丰富而复杂的自我认知形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强烈地冲击了传统文化对于精英文人的想象与叙述。传统身份伦理的合法性受到强烈的挑战。“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曾经天经地义的伦理规范,在五四经历了极速的反转——被斥为和耻为“吃人”礼教。冲击和挑战还有更“个人化”的表现,即希望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拆除君子与小人、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等级界限,希望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受到尊重,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这种理论要求在五四运动前后得到异乎寻常的凸显,例如,“劳工神圣”“到乡村去”等口号成为潮流,甚至不少知识分子还亲身亲力地到农村去从事乡村建设试验等等。

传统身份伦理在理论上瓦解的结果是要求每个人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下相互平等的个体——“公民”:拥有法治权利、承担法治义务。这种“公民”的出现,当然是五四精英文人对于未来“个人”的理想设计。不管这种“公民”认知在现代中国实现的程度怎样,但作为基本原则——它无疑影响了五四精英文人对于自身的想象与叙述。五四以后,理想中的“公民”不再生活于传统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之下,而是要脱身于历史主义的信仰,投身于创造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的宏伟历史进程中。“一个人在历史的时间天平上的位置,对人们关于自我的概念(self-conception)和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是很重要的”。^[19]在这样伟大的事业中,每一个“公民”都将获得丰富的人生意义,都可以从伟大献身中获得人生价值。个体新的人生价值定位直接决定了对“个人”的想象方式:如何认识历史,又如何献身于历史。

四、价值定位:被弃还是担当?

在五四以后的现代性语境中,精英文人普遍希望把自身与“历史”联系起来,希望以参与“历史”的方式分享其意义从而实现价值。但这种普遍性追求很快就带来五四精英文人自我价值定位的错落:自身既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主体,也有可能被迫痛苦地承受被“历史”遗弃的命运;同时,他们对“历史”所包含的尖锐的现代性力量究竟是更多地体现为破坏性还是建设性深感犹疑和不安。

郭沫若在诗集《女神》中,一方面歌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喷薄而出、自我的无限创造力充斥宇宙:“我要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另一方面孤独与痛苦的情绪却又不时地从这狂飙突进的自我中流露出来:不断感受“无限的孤独之苦”,时有“我倦了,我累了”的感触。这种错落的根源在于五四精英文人价值定位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普遍自居为启蒙者,自居为中国问题的解决者。在自我想象中,他们与“历史”是同一的,他们既是世界的权威阐释者与普遍意义的生产者,更是社会伦理资源的供给者;但另一方面,五四精英文人又深感在现实生活中进入这样一个意义生产机制并非那么容易,也就是说,“历史”可能拒绝他们,甚至要遗弃、要消灭他们。在五四精英文人的很多文本写照中,主人公往往是困顿不堪的小知识分子,同时,并存着的两种矛盾集于一身的自我想象:一方面觉得自己一无所用,是或迂腐或孑立的落魄的茆余之人;另一方面却又无一例外地心忧天下、自负为铁肩担道义的救世英雄。

鲁迅深受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他对这些新的思想又抱有浓重的怀疑态度,对通过叙事重建新的人生哲学和伦理秩序更是疑虑重重。他曾表示,“(我)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20]。在致亲友信中,他又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掩着,但还恐怕传染给别人”,^[21]“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有着很多偏激的声音”,^[22]“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野草》集之《希望》篇)。这种犹疑叙事虽然凸显了冲突与分裂,但恰是五四精英文人自身的政治文化冲突与撕裂的反映:既包含着时下抉择的隐痛,也包含着未来在做出正确抉择后“蓄之既久,其发必速”^[23]的惊天动能。

撕裂与抉择的背后,是五四精英文人对自身处境的一种现实认识:为了获得对未来的叙述与解释的权利,五四精英文人自身首先需要经历“历史”和“未来”的检视、需要被“历史”和“未来”的规则所“叙述”与“再叙述”。这就意味着五四精英

文人的自我认知需要不断根据未来政治发展而调适。表现于文本叙事中,就高光于五四精英文人的思想向着人民——尤其是劳工阶级——方向挺进并在行程中不断被改造和自我改造叙事的大量涌现。被改造和自我改造的叙事。这种调整和改造极大地改变了五四精英文人,“这就是知识者迈向这条道路上的忠诚的痛苦。一面是真实而急切地去追寻人民、追寻革命,那是火一般炽热的情感和信念;另一面却是必须放弃自我中的那种种纤细复杂和高级文化所培育出来的敏感脆弱,否则就格格不入。这带来了真正深沉、痛苦的心灵激荡”。^{[5][239]}

五、余论

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按照新的意义关联方式想象自我是现代性语境给予五四精英文人的全新信仰形式。在这背后,是中国社会的整体转换,即传统中国从整体上探索进入现代叙事并借此叙事去想象与实践。五四精英文人身处的撕裂与抉择的政治文化景观,展开后显像化的是中西政治资源之间不对等“对话”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五四精英文人积极输入了现代性观念和 历史观念,并融以个性主义、民族解放等启蒙思想,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叙事结构;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在当时激烈的排孔反儒的思想氛围中,仍以潜隐的方式对这种新结构的建构发挥了不可低估的视窗与透镜的功能。由于现代政治信仰形式与传统政治文化人格模式及道德内省机制的融合,在某种程度上既呈现和揭示了五四精英文人自我转型的苦痛与错落,又展现了他们对于自我的探索与追求以及更深地卷入了对民族国家政治叙事的复制与摹写。

五四精英文人这种撕裂与抉择的后续发展有两种取向:或是选择从“历史”中撤出,逐渐向个体内心收缩;或是选择以艰难的自我改造保持着对“历史”的信仰并不断前行——不但要在历史的界域定义自我想象,还要不断用思想跃迁来证明自己足具参与未来新样态政治的道德资格。走在后一路径的五四精英文人先后大都逐步下沉到工农大众之中。“与劳工为伍”、进入“劳工神圣的时代”,^[24]既是自我改造的必由之路,也是自我改造的必结之果。“知识分子在为工人服务、与工人结合的过程中,思想感情会不断发生变化,他们中的坚定分子将日益认识到劳动的伟大,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或者使这种信念更趋牢固。”^[25]那些汇集进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大潮的五四精英文人,追随并参与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立起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以各种叙事直接或间接为当时中国社会革命提供了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形成了融明确思想信仰与严格政治原则为一体的宏大而锐利的现代性话语系统。那些努力将自身整合到这一完整的意义关联域里去的五四精英文人,也在顺应推动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中达致个体价值的贯流、恒定与增殖,“历史生成性地实现个体与类的相互规定性”^{[3][49]}。

参考文献:

- [1]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J].东方杂志,1918,15(4).
- [2]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J].二十一世纪,1999(4):76.
- [3]班瑞钧.蒙元际君臣政治关系的隐喻转向[J].贵州社会科学,2014(9):48-54.
- [4]陈独秀.谈政治[J].新青年,1920,(8).
- [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 [6]李杨,孙绍振.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笔谈[J].文学评论,2001(2):5.
- [7]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1(1).
- [8]吴虞.“通信”[J].新青年,1917,2(5).

-
- [9]周作人. 自己的文章[M]//周作人散文:2辑.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 [10]胡适. 致陈之蕃[M]//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 中华书局, 1983:346.
- [11]胡适. 胡适口述自传[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252.
- [12]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23.
- [13]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61.
- [14]安希梦. 代译者序二[M]//历史哲学.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15]张崧年. 劝读杂志[J]. 新青年, 1918, 5(4).
- [16]傅斯年. 《新潮》发刊旨趣书[J]. 新潮, 1919, 1(1).
- [17]福柯. 什么是启蒙[J]. 国外社会科学, 1997(6):183-196.
- [18]曹植. 与杨德祖书[M]//昭明文选:卷四十二.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 [19]格鲁内尔. 历史哲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20.
- [20]鲁迅. 写在《坟》后面[M]//坟.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1.
- [21]鲁迅. 致李秉中信(1924年9月24日)[M]//鲁迅书信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 [22]鲁迅. 致许广平信(1925年3月18日)[M]//鲁迅书信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 [23]毛泽东. 民众的大联合[J]. 湘江评论, 1919(4).
- [24]H. M. 劳工神圣颂[J]. 新青年, 1920, 8(4).
- [25]肖超然. 关于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建立与活动[M]//文史资料选编:11辑.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1:57.